

东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

#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大本营

■冯江环 周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与领导下，率先掀起规模宏大的抗日救国斗争。从最初的抗日义勇军，到后来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东北军民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展开全面、艰苦且持久的斗争，这不仅是全国14年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军侵占东北全境后，党领导东北军民抗战的外部环境极为恶劣。首先，东北的国民党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几乎未作抵抗便全部撤入关内，这不仅造成大范围的政权与兵力真空，更使原本就较为薄弱的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直接暴露于侵略者的威胁之下。其次，日军占领东北后迅速推行殖民统治，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伪政权体制，不断挤压各级党组织和抗日军民的活动空间。再次，东北冬季漫长、气温极低，各支人民武装因缺乏充足给养和庇护场所，难以支撑较大规模部队的生存与战斗。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东北各级党组织在中央指导和带领下，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并逐步建立起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力的人民军队。其中，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由党在东南满和南满地区创建的抗日游击队发展而来，主要活动于磐石、桓仁、通化、延吉、琿春一带，并在此建立相对稳定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其在东南满一带开展抗日斗争的重要战略基地。

## 创正规军队，建立特区政府

在抗战初期涌现的众多小型游击队中，南满磐石县的游击队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并受到中共满洲省委的高度重视。1932年1月，省委专门派遣吉林特派员张玉珩和北满地委兵运工作负责人杨君武前往磐石，开展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他们从最初仅有七八个人的小型“特务队”（又称“打狗队”）起步，通过吸收优秀青年、争取伪军士兵、打击顽固汉奸等方式，不断扩大兵员和武器装备。到当年10月，这支队伍已发展为拥有120余人、75支枪的东北游击总队。同年秋，时任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的杨靖宇来到南满，着手整顿当地党组织和部队，把磐石当地的游击武装正式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显著增强了该地区的抗日力量，也为东北其他地区创建人民武装提供示范，为后续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军及建立以南满特区政府为代表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基础。

1935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发表《满洲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尝试在敌伪统治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机构，以保护群众利益、团结力量推翻殖民统治。并为建设东北人民政府先行试点。在具体政策上，省委充分考量群众根本利益，提出“将收获的八成给



吉林省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

资料照片

农民”“不向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出捐纳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化农民的法律”等要求，因而赢得广泛支持。到当年9月，临江、临江、柳河、通化、濛江、磐石等10余个县群众，已在党组织指导下组建人民革命政府筹备委员会，筹备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迈出了民主建政的第一步。

在后续政权建设中，南满特区政府坚持以“指导南满中华民族的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为根本目的，不仅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政府机关，如人民军事部、粮食部、财政部、司法部、教育部等，还在保障人民政治权益方面作出表率，明确规定“凡居住南满地区，不分职业、年龄、国籍、性别、民族、政治派别、宗教等，年满16岁以上者，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此政策下，广大群众积极支持人民政府，主动纳粮缴税，支援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斗争，逐渐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支撑力量。

## 破内忧外患，构筑反日同盟

东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始终面临严峻的内外困难。从外部环境看，无论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该地区与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乃至执行抗战任务的国民党部队均处于高度隔绝状态，党组织、军队和人民群众长期“孤悬敌后”，几乎得不到任何外部配合与支援。与此同时，日寇苦心经营的伪满政权体系相对完备，并持续对仅存的游击根据地实施“讨伐”与镇压，根据地内的党、政、军、民随时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从内部环境看，抗战初期，受“左”倾错误影响，中央曾要求东北效仿南方苏区建立苏维埃式根据地政权，虽出发点正确，但在执行过程中覆盖面较窄，且因政策激进挫伤部分群众抗战热情，导致根据地政权稳定性不足。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提出“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抗日。根据这一指示，南满的磐石县迅速调整建政方式，摒弃相对集中的苏区模式，转而通过农民协会、反日会及人民代表大会等形式，组建临时东北人民政府南满特区政府，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根据地建设与运行。以反日会为例，其组织形式灵活，通常3人以上即可成立分会，会员成分不限，只要不当天奸、坚决抗日均可加入；3个以上分会可组建支会，支会之上再成立总会。至1934年5月，南满地区17个县均建立了反日会组织，将大量决心抗日的人民群众纳入统一战线，直接参与对日斗争。同时，南满特区政府实施赋税减免政策，并明确对积极抗日的地主，其租粮可与佃农协商调整，既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又维护了地主阶层的抗战积极性。

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有效改善了根据地群众的生活条件，还显著增强了政权稳固性，使更多人力和物力得以集中支援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战斗与建设，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战林海雪原，开展游击战争

白山黑水、冰天雪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自1936年成立后，首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先决条件。为应对东北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抗联官兵依托山岭、山



##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洞、崖壁，开挖半地下的地窖子作为隐蔽住所。地窖子内部筑有土炕，既可储存物资，又能生火御寒。众多地窖子连成一片，便形成“密营”。密营通常选址于深山老林，不易被敌人发现和破坏，成为抗联部队的特殊驻地。随着部队规模扩大，密营的规模和功能不断完善，逐渐增设后方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设施，并在部分地区开展屯垦，补充粮秣给养，为长期抗战提供物质保障。

在战略层面，抗联第一路军始终肩负打通山海关、与关内党组织及八路军取得联系的重要任务。1936年6月至7月及同年秋季，第一路军先后筹划两次西征，原计划从本溪、凤阳之间直插辽阳，跨越南满铁路和辽河，直驱辽西、热河地区，但因严寒酷情和恶劣自然环境而失败。然而，西征行动具有积极意义：部队所到之处，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在营口、辽阳等我党我军基础薄弱地区扩大了影响力，让当地群众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坚定了驱逐日寇、光复失地的信念，为日后战略反攻奠定了思想基础。

虽然西征未能取得胜利，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在东南满一带开展的游击作战，仍给敌人造成沉重打击。1938年2月，总司令杨靖宇率部抵达辑安开展游击作战，首战即奇袭老岭隧道工地。老岭隧道是通化至辑安铁路的关键工程，日寇企图借该铁路以掠夺自然资源。杨靖宇与参谋长杨俊恒商议后，决定彻底破坏工地以延误工期。他先派战士化装成劳工混入工地，3月13日黄昏亲自指挥部队分路进攻守敌。由于准备充分，战斗迅速结束，毙伤伪军12人。杨靖宇随即组织部队运出粮食弹药，释放1700余名被强迫劳动的群众，并放火烧毁仓库、厂房、工棚，给敌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在东南满地区频繁出击，不仅造成敌人较大损失，更在心理上震慑对手。日伪当局曾承认，“治安状况至今仍然未能基本安定，根本原因是成为东边道癌瘤的杨靖宇等匪未能除掉”。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抗联第一路军在极端艰苦环境中坚持战斗，总司令杨靖宇、副总指挥魏拯民先后牺牲，东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各级人民政府也长期动荡，甚至一度丧失大部分地区。然而，党的抗日主张和民主政策深入人心，使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较高抗日热情和信心，并为日后关内部队挺进东北、开展战略反攻提供了重要基地。抗联第一路军的英勇战绩彪炳史册，其不畏战斗不仅彰显了党领导和顽强拼搏精神，更以实际行动保护了东北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产活动，是抗日游击根据地政权在战火中长期维系的重要保证。

红25军长征后，红28军于1935年2月3日在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再次组建，下辖第82师和手枪团，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不久后，国民党军便调集重兵对留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实施梳篦式的“清剿”。

当时，仅有1000余人的红28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依托大别山层峦叠嶂、林密沟深的复杂地形，探索总结出一系列以弱胜强、灵活机动的战术。每当敌人展开大规模“清剿”，红28军便利用山区地势迂回转移、东西穿插、南北周旋，使敌人难以掌握其行动规律，无法实现合围与堵截；一旦出现有利条件，便果断抓住战机，集中力量歼灭一部敌军。通过贯彻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的方针，红28军不仅有效保存自身力量，还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最终突破敌人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在艰苦卓绝的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中，中畷湾战斗便是红28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之一。

1935年12月15日，红28军特务营、手枪团1分队在安徽省天堂寨地区与第5路游击师会合，之后经立煌县后畷、四望岭地区向渔潭方向前进。尾追之敌国民党军独立第5旅615团团长曹兴文率5个连寻踪“探剿”，当晚到达王立墩。17日晨，红28军从渔潭向西南方向转移，途经乾沟岭进至乌龙岩地区时，遭到在当地掩护修筑碉堡的敌第189团1营截击。红28军稍作接触后，即向南经罗家湾、黑岩向大黄栗树岭方向转移。

当日11时许，红28军进至大黄石岭北侧中畷湾地区时，敌第189团1营杨家山、凉亭庙方向寻踪追来。为摆脱尾追之敌，红28军指挥员决心利用中畷湾地区山高地密、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出其不意伏击歼敌。随即，部队召开干部会议，明确任务分工并研究战术打法。具体部署为：特务营在中畷湾树岭占领有利地形，一线展开担任正面阻击；手枪团1个分队隐蔽配置于水竹塘东南侧丛林中；第5路游击师作为预备队，随指挥所配置在朱家山北侧高地。各部受领任务后，迅速进至预定位置，做好战斗准备。

12时许，敌第189团1营进至中畷湾北侧山梁，当即与正面阻击的杨家营交火，双方形成胶着态势。战斗约1小时后，敌第615团共5个连分两路赶来增援：其中约3个连的兵力由曹兴文率领，经凉亭庙向中畷湾北侧山梁前进，欲与第189团1营会合加入战斗；另一路约2个连的兵力，经大竹坪插向蜜蜂寨南侧高地，企图迂回红28军左翼实施包围。当曹兴文率领的增援主力

红25军长征后，红28军于1935年2月3日在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再次组建，下辖第82师和手枪团，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不久后，国民党军便调集重兵对留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实施梳篦式的“清剿”。

当时，仅有1000余人的红28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依托大别山层峦叠嶂、林密沟深的复杂地形，探索总结出一系列以弱胜强、灵活机动的战术。每当敌人展开大规模“清剿”，红28军便利用山区地势迂回转移、东西穿插、南北周旋，使敌人难以掌握其行动规律，无法实现合围与堵截；一旦出现有利条件，便果断抓住战机，集中力量歼灭一部敌军。通过贯彻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的方针，红28军不仅有效保存自身力量，还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最终突破敌人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在艰苦卓绝的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中，中畷湾战斗便是红28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之一。

1935年12月15日，红28军特务营、手枪团1分队在安徽省天堂寨地区与第5路游击师会合，之后经立煌县后畷、四望岭地区向渔潭方向前进。尾追之敌国民党军独立第5旅615团团长曹兴文率5个连寻踪“探剿”，当晚到达王立墩。17日晨，红28军从渔潭向西南方向转移，途经乾沟岭进至乌龙岩地区时，遭到在当地掩护修筑碉堡的敌第189团1营截击。红28军稍作接触后，即向南经罗家湾、黑岩向大黄石岭方向转移。

当日11时许，红28军进至大黄石岭北侧中畷湾地区时，敌第189团1营杨家山、凉亭庙方向寻踪追来。为摆脱尾追之敌，红28军指挥员决心利用中畷湾地区山高地密、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出其不意伏击歼敌。随即，部队召开干部会议，明确任务分工并研究战术打法。具体部署为：特务营在中畷湾树岭占领有利地形，一线展开担任正面阻击；手枪团1个分队隐蔽配置于水竹塘东南侧丛林中；第5路游击师作为预备队，随指挥所配置在朱家山北侧高地。各部受领任务后，迅速进至预定位置，做好战斗准备。

12时许，敌第189团1营进至中畷湾北侧山梁，当即与正面阻击的杨家营交火，双方形成胶着态势。战斗约1小时后，敌第615团共5个连分两路赶来增援：其中约3个连的兵力由曹兴文率领，经凉亭庙向中畷湾北侧山梁前进，欲与第189团1营会合加入战斗；另一路约2个连的兵力，经大竹坪插向蜜蜂寨南侧高地，企图迂回红28军左翼实施包围。当曹兴文率领的增援主力

红25军长征后，红28军于1935年2月3日在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再次组建，下辖第82师和手枪团，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不久后，国民党军便调集重兵对留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实施梳篦式的“清剿”。

当时，仅有1000余人的红28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依托大别山层峦叠嶂、林密沟深的复杂地形，探索总结出一系列以弱胜强、灵活机动的战术。每当敌人展开大规模“清剿”，红28军便利用山区地势迂回转移、东西穿插、南北周旋，使敌人难以掌握其行动规律，无法实现合围与堵截；一旦出现有利条件，便果断抓住战机，集中力量歼灭一部敌军。通过贯彻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的方针，红28军不仅有效保存自身力量，还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最终突破敌人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在艰苦卓绝的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中，中畷湾战斗便是红28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之一。

1935年12月15日，红28军特务营、手枪团1分队在安徽省天堂寨地区与第5路游击师会合，之后经立煌县后畷、四望岭地区向渔潭方向前进。尾追之敌国民党军独立第5旅615团团长曹兴文率5个连寻踪“探剿”，当晚到达王立墩。17日晨，红28军从渔潭向西南方向转移，途经乾沟岭进至乌龙岩地区时，遭到在当地掩护修筑碉堡的敌第189团1营截击。红28军稍作接触后，即向南经罗家湾、黑岩向大黄石岭方向转移。

当日11时许，红28军进至大黄石岭北侧中畷湾地区时，敌第189团1营杨家山、凉亭庙方向寻踪追来。为摆脱尾追之敌，红28军指挥员决心利用中畷湾地区山高地密、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出其不意伏击歼敌。随即，部队召开干部会议，明确任务分工并研究战术打法。具体部署为：特务营在中畷湾树岭占领有利地形，一线展开担任正面阻击；手枪团1个分队隐蔽配置于水竹塘东南侧丛林中；第5路游击师作为预备队，随指挥所配置在朱家山北侧高地。各部受领任务后，迅速进至预定位置，做好战斗准备。

12时许，敌第189团1营进至中畷湾北侧山梁，当即与正面阻击的杨家营交火，双方形成胶着态势。战斗约1小时后，敌第615团共5个连分两路赶来增援：其中约3个连的兵力由曹兴文率领，经凉亭庙向中畷湾北侧山梁前进，欲与第189团1营会合加入战斗；另一路约2个连的兵力，经大竹坪插向蜜蜂寨南侧高地，企图迂回红28军左翼实施包围。当曹兴文率领的增援主力

# 红军中畷湾伏击战

■梁启远 周杰

进至中畷湾北侧山梁时，手枪团1分队的红军官兵迅速兵分两路出击：一路沿水竹塘北侧山梁由东向西攻击，另一路由太湖佬从北向南攻击。特务营见手枪团1分队在敌左翼和侧后打响，立即经中畷湾东侧向敌勇猛冲击，一举夺取敌人的机枪阵地。

中畷湾北侧山梁之敌在红军部队三面围攻下，大部被歼，其余敌人四处溃散。与此同时，敌2个连的迂回部队在进至蜜蜂寨南侧高地后，被第5路游击师居高临下以火力阻击，无法继续前进。战至15时许，红军指挥员下令收拢部队，撤出战斗，向天堂寨方向转移。

此战，红28军毙敌12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200余支、子弹5000余发，以较小代价给予敌人重大杀伤，沉重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 链接历史

# 惊雷一声震敌胆

——中国古代地雷

■曹波

地雷是一种布设在地面以下或地面上的爆炸性火器。主要由雷体和引火装置构成，其中雷体包含雷壳和内装火药。地雷在我国的使用历史可追溯到500余年前，最早的记载见于明朝嘉靖年间。当时，兵部侍郎熊在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期间组织人员制造地雷，但地雷的具体形制因史料缺失难以考证。此后，地雷被广泛制造并用于军事实践。抗倭名将戚继光在镇守东部沿海长城时，大量制造地雷并将其布设在隘口要道或设伏地域，有效提升了防御力。至万历年间，地雷种类显著增多，仅《武备志》一书便记载了10余种，包括炸炮、伏地冲天雷、无敌地雷炮、自犯炮和万弹地雷炮等。以下简要介绍当时几种代表性地雷。

炸炮的雷壳由生铁铸造，大小如碗，壳面留有装药口，装药后用木杵夯实，并插入小竹筒以引出火线。使用时，常将多个炸炮的火线串联，接入钢轮发火（一种通过外力触发爆炸的机械装置）的火槽内，再从该装置引出长线埋设于敌人必经之路。当敌人踩绊长线时，会牵动钢轮发火装置引发爆炸。除炸炮外，自犯炮和万弹地雷炮等也采用钢轮发火引爆机制。

伏地冲天雷则以火种引爆，其火种置于盆内并放在雷壳上，火线从雷壳引出后盘绕在盆底靠近火种处。盆面竖立几支长柄刀枪作为诱敌兵器，覆土掩埋以吸引敌军触碰。当敌兵试图拔取兵器时，火种倾倒引燃火线，进而引爆地雷。



明朝触发式地雷。

资料照片

无敌地雷炮属于人工点火引爆类型，其雷壳为生铁铸成的圆形结构，内装火药。装药后以硬木封堵雷口，并将3根引线装入长竹筒，竹筒口朝向己方以引出火线。地雷埋设于敌军必经之路，待敌人进入雷区后，士兵立即点燃引线引爆。

崇祯九年秋，清军阿济格部突破长城防线，直逼昌平。战事初起，明军诸将因指挥混乱与战术失当而束手无策。时任昌平兵备金事的耿飏临危请命，率部勘察七家岭山峡地形，洞察清军“长于骑射而短于山地作战”的弱点，遂于敌军必经隘险处秘密布设地雷阵。清军前锋蜂拥而至，在雷区触发机关，“雷从地起，烟与天齐”，爆炸声震彻山谷，伤亡惨重。其他人见状魂飞魄散，望风溃逃，昌平得以保全。此役堪称明朝地雷实战的珍贵例证，亦为明末火器应用与山地防御战术的典范之战。



##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 尘封墙洞里的红色交通证

■郭冬明 龙礼彬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柜中，静静陈列着一张巴掌大小的红绸布证件。这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色情报交通员欧阳倬的通行证。如今，这张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交通证，不仅为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色交通提供了重要历史见证，也生动展现了无数像欧阳倬这样的革命先辈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率部抵达井冈山地区，着手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加之国民党反动派频繁发动军事进攻和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根据地面临信息不畅、指挥失联的严峻局面。

为冲破敌人封锁、解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外联络特别是情报传递难题，我党在湘赣边界成立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专门负责通信联络工作。随后，在党的领导下，红军依托地方武装配合，在各级县、区、乡政府内普遍建立秘密联络点作为递步哨，每个递步哨由5至7名交通员组成，受各级政府直接领导。交通员主要承担传送文件任务，同

时负责转运药品、物资及护送相关人员。选拔交通员同样至关重要，既要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又要机智勇敢、熟悉井冈山地形。

经过精心考察和严格审查，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欧阳倬因忠实可靠、纪律性强且政治觉悟较高，被选为红色情报交通员，负责往返于茶陵至永新一线侦察敌情、传递情报。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间都留下他坚毅的足迹。而这张交通证正是他执行任务的重要凭证，凭借此证，他才能取得收信方收条并顺利返回复命。

为保障情报传递的绝对安全，欧阳倬始终严守交通员保密纪律，从未向家人透露真实身份。预感到随时可能暴露牺牲，他将儿子托付给好友照料，毅然踏上充满危险的征程。

1929年，欧阳倬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身受重伤，在家疗养期间自觉时日不多，遂向母亲说明情况并将交通证交其保管。母亲将证件藏于楼上墙洞内。后来，欧阳倬身份暴露，为躲避敌人搜捕逃至峡江县，独自隐入深山，过着艰苦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倬返回家乡，为不影响儿子与养父母的关系，始终未与儿子相认，也从未向他人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

1978年，欧阳倬去世。后来，生产大队将其房屋交由亲戚管理。在打扫房子时，他们在楼上墙洞中发现一个油布包裹，层层拆开可见两张交通证：一张为白色棉布所制，是通往白区的证件，因年代久远已破损；另一张为保存完好的红绸布交通证。尘封多年的红色往事由此重见天日。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战斗在井冈山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靠交通员们赤诚的忠心，成功开辟出3条至关重要的秘密交通线。这些交通线如同血脉，确保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中共中央及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江西省委的联系畅通无阻。许多像欧阳倬这样的交通员，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不惜抛家舍业、不惧寂寂无闻、甘愿流血牺牲，用他们坚实的脚步，在崇山峻岭间踏出一条条维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生命线，也踏出一条通往革命胜利的光明之路。



欧阳倬的红色交通证。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供图



位于江西省井冈山市茨坪店上村的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旧址。

资料照片